



周恩来与中日关系



陈答才 潘焕昭 著

重庆出版社

以 民 促 官

——周恩来与中日关系

陈答才 潘焕昭 著

重 庆 出 版 社

1998. 重庆

责任编辑 周世慧
封面设计 王 多
技术设计 刘黎东

陈答才 潘焕昭 著
以民促官——周恩来与中日关系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 经销 四川外语学院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0.625 插页 4 字数 265 千
1998 年 3 月第一版 1998 年 3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1~3,000
ISBN 7-5366-3884-1/K·202
定价:12.00 元

内 容 提 要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彼此间曾有两千年的历史联系和传统友谊。然而，由于近代以来日本军国主义者发动侵华战争，两国间形成了长达半个世纪的敌对关系。新中国诞生后，两国关系在起伏中重新走向正常化。

周恩来的少年时代眼见日本强占中国领土台湾而心生愤慨，忧国忧民；青年时期为探求东邻“国力大增”的奥秘而毅然东渡，又为投身以反对日本扩大在华侵略权益为中心的五四爱国运动辍学回国；华北事变后，作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主要角色之一，参与解决了举国团结抗日并取得彻底胜利的历史性课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身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亲自运筹对日外交，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为打破坚冰、开辟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航道，他率先倡导并身体力行人民外交，提出“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针，确定发展中日关系的“三原则”，主张依据积累渐进的方式，逐步推动中日两国由纯民间交往向政府间的正式关系发展。中日交流从无到有、由窄变宽，中日关系从紧张对峙到修复邦交，倾注着周恩来的心血，凝结着周恩来的智慧。历经 20 余载精心耕耘，终于在 1972 年结出邦交正常化的硕果。

出版说明

为了纪念周恩来诞辰 100 周年，我社组织了一套《周恩来风采》丛书，从周恩来与国共谈判、周恩来与共产国际、周恩来与中国外交、周恩来与中日关系等四个方面来展现周恩来在处理党与党之间、国与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中所表现出的折冲樽俎、巧解矛盾、深谋远虑、以民促官的伟人风采。这套丛书有如下特点：

1. 选材独特。当年中共与国民党、与共产国际；新中国外交、中日关系都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周恩来用他那超人的智慧和非凡的毅力较好地处理好了这些关系，为党和国家作出了独特的贡献。这几方面的内容也是关于周恩来生平事迹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为此，我们做了一些探索和努力。

2. 作者队伍强。作者是长期从事有关方面学习和研究的专家学者，奉献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是他们多年心血的结晶。

3. 融史料性与可读性为一体。由于作者充分占有现有资料，在写作中力图真实再现当年的情景，使这套丛书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同时，史与论的有机结合，娓娓道来，使该丛书有较强的可读性。

经过作者和编者的努力，这套丛书终于与读者见面了，望朋友们能接纳它，同时，我们更希望它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出更

多的精品之作来，使有关周恩来的研究更加深入。

编 者

1997年12月

目 录

第一章 历史的镜子	(1)
一 恨	(2)
二 求索	(7)
三 较量	(20)
第二章 改善关系的突破口	(44)
一 冲美日封锁	(44)
二 提“以民促官”的方针	(53)
三 选贸易为突破口	(65)
第三章 民间友好的积累	(76)
一 友好交往的恢复	(76)
二 贸易活动的开展	(95)
第四章 友好交往的升华	(115)
一 互访的规格升高	(115)
二 外交上的初步接触	(132)
三 友好交流的领域更广泛	(143)
四 经济贸易的新形式	(155)
第五章 关系逆转时期的“三原则”	(167)
一 政治三原则	(167)
二 贸易三原则	(181)
三 半官半民的中日关系	(193)
第六章 广泛的民间外交活动	(210)

一	文化交流结硕果	(211)
二	体育交流显魅力	(227)
三	全方位的人民外交	(239)
第七章 周恩来在日本人心中	(253)	
一	政界的评价	(254)
二	民间的赞誉	(261)
三	“周樱”与“诗碑”	(278)
附:	1. 周恩来与中日民间外交大事记	(283)
	2. 参考书目	(331)

第一章 历史的镜子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岛国，西隔东海、黄海同中国相望，与中国大陆最近处 740 余公里，南端的先岛群岛同中国的台湾省仅 180 余公里之距。中日两国确是一衣带水的邻邦。

从日本列岛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古代日本人与中国大陆相交通，是他们对外联系的重要渠道之一。根据日本古代的神话、传说及近代对于海流的多次实际调查来推测，在航海技术十分落后的远古时代，是日本海的左旋回流把中国大陆与日本列岛联系起来，成为中日之间最古老的自然航路。

两国友好往来更是源远流长。公元前 202 年，汉王朝代秦而起。前 109 年，汉武帝在中国东北及境外，建立乐浪、真番、玄菟、临屯四郡。公元 1 世纪，班固所编《汉书·地理志》写道：“乐浪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以岁时来献见”，是比较可靠的关于中日交往的最早记载。这时日本正处在原始公社制度末期，部落内部已出现了不同的分工，部落之间为争夺农业用地而不断发动战争，强大的部落开始奴役和榨取弱小的部落，因此，这里说的“百余国”还不是现在意义上的国家，而是部落或部落联盟。据考古发掘，日本九州北部一些部落酋长的支石墓中，有铜剑、铜铎、璧玉等陪葬，并有汉代的中国铜镜或仿制品，有的墓中竟多达 30 面以上。这些属于弥

生时代中期的墓葬，反映了日本阶级分划的情况和中日之间的早期来往。

公元5世纪，范晔编著的《后汉书》又记载，公元57年（后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倭奴国派遣使者前来中国，汉光武帝赠以印绶。关于这个倭奴国，日本史学者解释为委的奴国，“奴”即“惟”，位于今九州北部福冈市附近。

从文化联系上看，日文的平假名不仅是汉字演化的产物，而且众多的词汇直接用汉字表达。

公元6世纪末，日本飞鸟时代的圣德太子，为了实行政治改革，加强与中国隋朝的交往，频繁向隋遣使。

作为中日友好交往的第一次高潮，7世纪日本18次派遣唐史，而阿倍仲麻吕来唐，唐鉴真和尚赴日，更是中日友好交往的佳话，为世代传诵，从而使中国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到日本的整个社会，出现了所谓“唐化时代”。

还有，中国的五代时期中日民间交往畅通；宋时日僧曾来中国参拜圣地；明太祖为加强睦邻友好关系，也多次向日本派遣使者，使两国政府间的贸易再次开展起来。源远流长的中日友好关系在不断发展。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有曲折，……

一 恨

1. 历史进入近代，不仅西方列强一次次侵华，而且同样受过西方侵略的日本也追随西方加入武装进攻邻国的行列

历史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和日本都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

略的对象，均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19世纪40年代以后，西方列强发动一系列侵华战争，使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与此同时，日本的大门也于1854年被美国打开，俄、英、法等国接踵而入，日本同样面临着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危机。日本学者纷纷著书撰文，介绍中英鸦片战争的背景与经过，希望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1868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希望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破除国内封建制度，走上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以摆脱沦为殖民地的危机。于是，一切向欧美学习，成为19世纪70年代日本政治的基本路线。日本这种应变的精神和举措无疑是正确的，它一改日本历史的方向和进程。

然而，又令历史遗憾的是，在这种变革的同时，明治政府又追随西方列强加入到侵略邻国的行列，走上了军国主义的道路。1894年初终于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侵略——甲午战争。

战争中，日军竭全力，猛推进。平壤陆战和黄海海战，清政府无能，军队失利败退。10月，日军分两路侵入中国领土，陷大连、占旅顺，对中国军民施行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整个旅顺只剩下掩埋尸体的36人。至1895年1月威海卫战役后，北洋军队全军覆没。清政府乞降求和，日本轻举获胜。更严重的后果还在于，明治政府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强占中国的台湾省及附属岛屿，强行索取2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和3000万两的“还辽费”，攫取了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工厂的权利，从而使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这样，对中国人民来说，日本不仅加入了列强压迫中国的行列，而且已经成为瓜分中国的元凶之一。

甲午战败后，软弱无能的清政府看到沙俄在主谋三国还辽中显示出来的力量，并幻想藉此向日施加压力，遂于1896年6月同

沙俄签订了共同防日的《中俄密约》，开始了所谓联俄拒日的外交路线。然而，这是一条前门拒虎、后门引狼的路线，到 1898 年 7 月以后，中国旅大便落入沙俄魔掌。

2. 在内忧外患深重的日子，苏北平原有一个男性婴儿降生，随着他人生阅历的翻揭，把这段国恨深深地铭刻在心中

就在帝国主义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最激烈的日子，在内忧外患最深重的时候，1898 年 3 月 5 日，在中国苏北平原上一座古老的城市——淮安，有一个男性婴儿降生，他乳名叫大鸾，后来叫周恩来。

日本早就觊觎中国的东北，在无法抗衡俄、法、德三国联合压力的情况下，才被迫吐出了辽东半岛，但它并没有消除重新夺取这一地区的野心。

豺狼虎豹皆猛兽。资本主义列强的本性决定了他们也有互相争斗的时候。经过充分准备，1904 年 2 月 8 日，日本联合舰队袭击俄国舰队于旅顺，日俄战争的序幕拉开了。

清政府越来越软弱，战前无力阻止日俄两国在中国领土上开战；战争爆发，又奴颜婢膝地声明“日俄两国均系友邦”，宣布在战争中“严守中立”，还按日俄要求，将辽河以东划为战场。

战争结果是俄国败北。1905 年 9 月，交战双方签订《朴茨茅斯条约》，日本从俄国手中继承了在中国东北南部的全部侵略特权，对东北人民进行极其野蛮的殖民掠夺和奴役。

1910 年，日本又吞并朝鲜。朝鲜同中国的东北只有一水之隔，唇齿相依。朝鲜人民遭受的惨祸，更使东北人民惊心动魄，寝食难安。正是在这一年，周恩来，他刚满 12 岁，还是个少年，因家庭的变故，生活所迫，随同回家探亲的三堂伯，远离江淮平原的故

乡，来到白山黑水的东北，与在这里谋生的伯父周贻庚团聚、生活。

3. 一段时间不长的牧童经历和“大鼻子”、“小鼻子”的新鲜词儿，初步萌发了少年周恩来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恨

东北显然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华争夺的焦点，这不能不给少年周恩来带来异常强烈的刺激。

刚到东北，经人介绍，周恩来曾在平顶堡地运所屯于百川家干过一段牧童。

不久，周恩来得以入银州（今铁岭县）的银冈书院（初级小学）读书。在这里，国文、算术、历史、地理、格致、音乐、图画和体育皆习。在体育课的一次登山中，他又顺路与小同学在龙首山看过“日露战迹碑”。

开始，周恩来还不明白何谓日露战迹碑？小同学重复说：“日，是小鼻子日本；露，是大鼻子俄国，就是日俄战迹碑。”另一个小伙伴接着说：“它是日露战争后，小鼻子纪念战死者的。”这位小朋友还愤愤不平地进一步说：“外国人跑到俺们中国来打仗，还立啥碑，这叫啥名堂？！”

烟笼山上日军战迹碑，使周恩来对日本军国主义更加愤恨，不是吗！在此后不久的一次修身课上，老师问学生：读书是为了什么？同学中有的说是为了帮父母记帐，有的说是为了个人的前途。周恩来则坚定地回答：“为了中华之崛起！”

4. 在南开学校，少年周恩来的爱国热忱“已达于沸点”，一篇篇笔锋犀利的文章，都充满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在天津救国储金募捐大会上，他号召国人誓雪国耻，坚决不当亡国奴

1913年初，周恩来因伯父工作调动，他也随之搬到天津。经

过一段时间的补习功课，8月就考入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开办的南开学校。是年，他15岁。

在这里，他学习成绩优秀，国文和数学尤为突出；在品行方面，毕业时《同学录》中对他作了这样一段评语：“君性温和诚实，最富于感情，挚于友谊，凡朋友及公益事，无不尽力。”特别难能可贵的是，随着他年龄的一天天增长和对国情更深入的了解，周恩来忧国忧民的心情更加炽热了。

他在南开学习的四年，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处境继续恶化。民国虽然成立，政权却很快落到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的手中。令人心如刀割的坏消息像雪片般飞来。英国武装侵犯西藏、沙俄策划外蒙“独立”，……周恩来感到极大的痛苦。

时间在推移，中国坠入更加深重的灾难之中。1915年5月9日，袁世凯欣然接受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其中规定，给予日本在我东北、内蒙、山东、湖北、广东等地以政治经济特权，并由日本以“顾问”方式控制中国的财政、军事和警政，这无异于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这样，5月9日就成了“国耻日”，人民掀起的反袁浪潮一浪高过一浪。周恩来在南开“敬业乐群会”上发表激昂的演说，声讨日本和袁世凯的勾结，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随后，他在一篇作文中又写道：“呜呼！处今日神州存亡危急之秋，一发千钧之际，东邻同种，忽逞野心，噩耗传来，举国骚然，咸思一战，以为背城借一之举，破釜沉舟之计。一种爱国热忱，似已达于沸点。”

其时，舆论界普遍认为，中国之所以丧权辱国，是因为经济落后，国库枯竭，无钱武装军队。于是，有人发起在民间募捐储金，这一爱国义举首倡于上海，并迅速扩展到南京、北京、天津等大城市。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6月6日，天津数万民众聚集海河

畔的河北公园，举行天津救国储金募捐大会。神州沦亡的危机激起群情振奋，爱国绅商、学界名流，纷纷登台发表演说。中等身材、穿浅色长袍的少年周恩来走上讲台，号召国人奋起图强，振兴本国经济，誓雪国耻，坚决不当亡国奴。

是年冬，周恩来又写成《或多难以固邦国论》的文章。该文以强烈的爱国热情写道：“自海禁大开，强邻逼处，鸦片之役，英人侵我；越南之战，法人欺我；布楚之约，俄人噬我；马关之议，日人凌我；及乎庚子，诸国协力以谋我，瓜分豆剖，蚕食鲸吞，岌岌乎不可终日。”文中针对袁世凯“忍耻受辱，逐条承认”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一事，痛心疾呼：“事急矣，时逼矣，非常之势，多难之秋，至斯亦云极矣”，“莽莽神州，已倒之狂澜待挽，茫茫华夏，中流之砥柱伊谁？弱冠请缨，闻鸡起舞，吾甚望国人之勿负是期也。”

无论是在东北魏家楼日俄战场遗址怒视的目光，还是在天津的演讲及笔锋犀利的文章，都充满了对腐败政府的恨，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

二 求索

1. 劫波叠起民情长存，痛定思痛探寻挨打的原因。中学毕业后，19岁的周恩来决心“大江歌罢掉头东”，去日本探求仇敌“国力大增”的奥秘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促使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以改变祖国的命运。他们认为“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这

样，“向日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派遣留学生之多，达到了惊人的程度。”^①其中又以去日本的人数最多。这是因为日本在学西方上有个特点，“凡西学不切要者”，则“删节而酌改之”，使许多西方的理论日本化；加之两国是近邻，文字、风俗习惯多有相似之处，因此通过日本来学习西方，既方便又便宜，不失为一条“省力效速”的捷径。

中国的旧民主革命自从同盟会成立以后，进入了一个新的高潮。一大批献身中国革命的先进分子，如孙中山、廖仲凯、黄兴等都曾在日本留学或以日本为据点从事革命活动。后来，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陈独秀、鲁迅、钱玄同；著名的新文学家和哲学家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周扬、艾思奇；民主政治家沈钧儒、黄炎培、何香凝；无产阶级革命家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等。他们的革命活动大多受益于日本化的“欧风美雨”。

1917年6月，周恩来以各科平均89.72分的优良成绩从南开学校毕业。

毕业后该怎么办？同班同学有的已被金陵大学录取，有的拟考清华大学，有的已先期到日本，计划在那里的高等学校深造。……周恩来不仅年轻，而且有远大抱负，希望继续求学，但因家境贫寒，难以给他多少支持。正在他犯难的时候，既是老师又是朋友的马千里问周恩来：“你去哪儿，主意拿定没有？”

“去日本。”周恩来回答说：“校长说过，东邻日本，民气发扬，人知自治，明治维新，国门大开，汲取了欧美的治国之道，全力推行欧美工业化和现代化，这才国力大增，令世界瞩目。再者，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习俗相近，本班吴瀚涛、张蓬仙早已在彼，而张鸿诰、王朴山又相继去了，我当尾随其后。”

“去吧，费用，你就不用愁了。”说着，马千里从口袋掏出10元

大洋，“这钱，作燃眉之急，你先购置些必备之物”。随后马千里又串通张彭春、时子周等几位与周恩来交往甚密的老师，筹措了一笔路费，帮助他去日本求学。

8月30日，周恩来即将起程，他给同学写下临别赠言：“愿相会于中华腾飞世界时。”

9月，他由天津登轮东渡。临行前夕，又写了一篇抒发救国抱负的诗篇：

“大江歌罢掉头东，
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
难酬蹈海亦英雄。”

诗言志。这首诗气势豪迈，含义深刻，反映了青年周恩来立志救国的坚定信念和博大胸怀。

轮船自海河起锚，缓缓向前。周恩来站在甲板上，向岸边送上行的朋友挥手告别。

轮船经过已成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驶向日本。周恩来一行是在神户登岸，继乘火车，经大阪至京都、名古屋抵达东京。

周恩来尽管是第一次来到异国他邦，但由于南开留日同学很多，所以，他初来乍到，一连许多天，都沉浸在昔日同窗欢聚的氛围里。

2. 到日本，周恩来拟报考政府官费补助的学校，但他不是一味死读书的人，勤于观察、善于思考的周恩来，很快把了解日本社会同改造中国联系了起来